

责编 崔 燕 王 瑜 美编 李晓萌 审读 李 斌 排版 吕 雪

◆ 罗银胜

# 愚园路上的顾准

当代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1917—1974），这位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党员，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与陈毅、潘汉年、方毅等同为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兼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时，他就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自由发展，并以市场价格调节”的观点，成为新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

顾准1949年5月到上海工作后，被安排住在愚园路1182号。这是一幢花园洋房，院子门口设有门房，屋前有一块长约50米、宽约20米，可以当网球场的西式大草坪，屋后也有大片空地，环境幽静。院内种着许多花木，几株西洋玉兰树紧挨窗前。主楼内铺着柚木地板，前厅设有一个放置鲜花的花坛，共有大小十几个房间。院子的北部、东部各有一幢两层的副楼，北楼底层是汽车库。

在这栋楼里除了顾准一家之外，同住的还有顾准在财政局的几位同事。顾准一家住在洋房的二楼，他们夫妇住一个大间，母亲带着几个孩子住一个大间，另有一个大间是顾准的会客室。两个小间内，分别住着两个警卫员和保姆。靠楼梯口，还有一个很宽敞的会客室，因为顾准会见的客人特别多。三楼另有一个

小间，也属于顾准家使用。

顾准和夫人汪璧及孩子们住进去后，根据他的要求，屋内原有的豪华家具立即被总务人员拉走，另找了一套极普通、也极简单的家具送来。去过顾准家的人，现在还能回忆起，那是一套普通家庭都“看不上”的家具，只是能用而已。唯一特别的是，按照顾准的生活习惯，他们夫妇的卧室里，在床头柜两侧各放一张单人床。而母亲和孩子们合住的房间，则挨墙摆着一溜木架床，靠门口放着一张饭桌，那是他们全家人吃饭的地方。客厅里除了几张沙发和茶几，显得空空荡荡。顾准喜欢这种俭朴实用的风格。

这时顾准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了，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后来为我们介绍了顾准添嗣的一些情况：“1937年前后的两三年中，顾准曾经有过两个男孩子，都在不满两周岁时夭折了，患的是同样的脑膜炎症。我没有听到顾准和我谈起过他的这两个孩子和他对丧失这两个孩子的感受，不过我确实在无意中看到过汪璧在两个孩子夭折以后所写的书面材料，这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在丧失了自己心爱的孩子以后用血泪写的，深沉的悲愤，读了令人摧折心肺。中国民俗有这样一个规矩：为了使孩子容易成活，常常给孩子起一个贱名。因此顾准以后生的几个孩子依次起的乳名是稻头（苏北方言，指玉米）、小米、高粱……五个孩子的学名分别

是淑林、逸东、南九、秀林、重之。从学名可以看得出来，老大和老四是女孩，其他三个是男孩。稻头1942年底或1943年初生于苏北淮海区。1942年起，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也是解放区最艰苦的时期。为了度过困难时期，解放区一律执行精简方针，因此，稻头生下来不久，汪璧就携女回到上海，和祖渡一起生活。后来汪璧于1944年重返解放区，孩子和祖母留在上海。1945年，抗战胜利，经组织批准，我到上海接我母亲和稻头到解放区，此时顾准已从延安回到华中解放区的淮阴，顾准一家在这里团聚了。可是好景不长，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内战烽火又重新燃起，我母亲以年近七旬的高龄，在内战的硝烟中奔走，从苏北到山东，由鲁南而胶东，最后被迫冒险渡过渤海湾到大连。这时，汪璧又生下了小米，小米学名之所以叫逸东，我虽然没有直接问过顾准，不过，我推测是蕴含有被迫东撤大连的意思。1949年解放上海以前，顾准又添了一个男孩（高粱），在上海又添了一个女孩（秀林，乳名五五）、一个男孩（重之，乳名小弟）。”

顾准和汪璧那时风华正茂，普遍受到人们尊敬。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健康活泼地成长着。老母亲操持家务，一家人生活得十分愉快。周末，倘若顾准回来较早，家里总是融融一室，欢声笑语不绝。顾准有时还爱和孩子门一起做做游戏，给他们讲革命故事。

顾准在上海与其他进城干部一样，实行供给制，在生活要求不高的顾准看来，这样生活是相当不错的。顾准一家饮食起居也无什么特殊之处，他不吃小灶，中午到市政府大食堂打饭。晚上如果要开会（据顾回忆，晚上开会是十分频繁的，特别是在1950年），则预先随便买两个葱油饼权作点心，垫垫饥，会后回到家里才吃晚饭。1950年春到1951年初，他与市工商联的资本家代表常常要协商税务工作，开会总在上海大厦，会后常有便宴。这样他便把那两个葱油饼包好带回家去，作为次日的早点。

据当时的同事回忆，顾准参加宴会时，会换一身整齐的中山装，一双黑皮鞋，将三七开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进入宴会厅，便把外套一脱，露出整洁的白衬衫和西式背带长裤，显得既朴素又带点洋派。这是顾准最喜欢的一身装束。上海工商界人士都说他很有风度，具有绅士的派头。

顾准在上海的那几年，为他后来的经济学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后来，顾准一家和上海市财政局的领导都先后搬离愚园路1182号，这里变成了长宁区少年之家。长宁区少年之家于1952年6月1日在武夷路245弄1号成立，1958年9月迁入愚园路1182号，随后，长宁区少年科技指导站也并入少年之家。1960年1月1区，少年之家在原来的基础上成立了长宁区少年宫，并迁入了新址。



◆ 滕建泽

## 读书的两重境界

古人有言：“书犹药也，善读者可以医愚。”此言关键是一个“善”字，“善读”就是会读的意思。南宋学者陈善《扞虱新语》认为：“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真切，此是人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人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知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唯知出和人，得尽读书之法也。”我理解，这段话是在告诉我们，读书之法在于“出”和“入”，就是既能“人得来”，又能“出得去”。“人得来”才能“见得真切”，“出得去”才能“用得透脱”。这其实就包涵了善读书的“两重境界”。

一是“人得来”。就是要熟读书，口诵心念，让身心融入书本里，潜心研读与探索，切实下功夫把书读懂了、悟透了。这是“善读书”的第一重境界。

古人对于熟读书的作用是非常推崇的，宋朱熹认为：“大抵观书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这是朱子对于熟读书至深至切的理性思考。“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蹊径。”曾国藩《家训》中的这一段话，说的大致也是这个意思。日常生活中，人们还是习惯于将这些较为深奥的道理用一些老百姓更容易听明白的口语化的方式来表达，比如“会背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溜”“《文选》烂，秀才半”等等，就将熟读书的作用表达得更加形象生动。更有甚者，说的是宋朝宰相赵普，居然靠背下半部《论语》打天下，还要靠另半部《论语》治天下。把《论语》这本书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我觉得不太可信。但是，要读懂一本书，根本的一点是要熟读熟记，掌握其内涵精髓，尔后才能消化、吸收，转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恐怕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历史上熟读书的高手不乏其人，人所共知的有《三国演义》中的张松。曹操写了一本书叫《孟德新书》，很是自负。可张松为了灭灭曹操的气焰、长长蜀人的威风，将《孟德新书》只看了一遍，便能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还羞辱曹操：此书乃战国时无名氏所作，蜀中即使三岁小儿也能倒背如流，此书是曹操抄袭了古人的。害得曹操恼羞成怒，将费了半生心血写成的兵书付之一炬。到了唐朝，又出了一位叫常敬忠的背书能手，十五岁就能背诵五经。唐玄宗李隆基叫燕国公张说拿了一本万言书对其测试，问他读十遍能否背得下来，常只读了七遍便背熟了。

古书记载是否属实，难以考证也无须考证。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没有什么可走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下功夫。“书山有路勤为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宋朝读书人陈正之曾路遇朱熹，向朱熹讨教读书的诀窍。朱熹说，每次五十字，连续三百遍。古时候的那些读书人，因为书籍得之不易、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对于读书是肯下功夫的。“头悬梁，锥刺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被誉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也没有放下读书，他始终坚持“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这真的是需要我们认真体会感悟的。

二是“出得去”。就是在将书本知识学深、读透的基础上，深刻领悟其精神内涵和所蕴含的客观规律，走出书本，将书本知识转化成自己的工作能力，并灵活运用于工作实践。这是“善读书”的第二重境界。

只会读书而不知灵活运用学到的知识，那是把书读死了，人们常说的“书呆子”就是对这一类人物的讽刺。“书呆子”的代表人物有战国时“纸上谈兵”的赵括。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每与赵奢谈兵论阵都是口若悬河，俨然一部活兵书。但由于他只知照本宣科，不会灵活应变，到头来害得赵国“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男儿”。长平一战，赵括在历史上也被贴上了“纸上谈兵”的标签。

清代的纪晓岚，也写过一位读死书的人物，此人姓刘名羽冲。他偶然得到一部古人兵书，便如获至宝地伏读经年，认为自己掌握了兵书精髓、熟知了兵法韬略，可将兵十万，便自告奋勇地带着兵去剿土寇。结果，不但仗打得一败涂地，就连自己也几为土寇所擒。后来，他又得到一部古人修水利的书，又是伏读经年，认为自己取得了治水的真经，能将千里荒田变成沃野，便急于找一个平台展示自己的才能，遂毛遂自荐于州官。州官半信半疑，就尝试着让他主持修建一个村庄的水利，结果却修出了水患。至此，他抑郁了，常常自言自语：“古人岂欺我哉？”不久便抑郁而死。至死他都没有想明白，兵书并没有欺他，而是他不知变通、泥古不化的必然结果。

善读书的人，能够将所学知识活学活用。苏秦“头悬梁，锥刺骨”，他发愤读书，深研兵法战策，治国韬略，从书中悟出了合六国之力，使强秦却步的纵横之术，终成一代纵横大家；岳飞读书为报国，从书中读出了“还我河山”的民族气概和一代名将的见识风范。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是南宋诗人陆游对于读书与应用关系的总结。善读书，就是一个学而思、思而行、行而悟的过程，是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的统一。读书是为了应用，“人得来”是前提，“出得去”是目的，既能“人得来”，也能“出得去”，才是真正掌握了读书的真谛。

◆ 石泽丰

## 迁居

外面是漆黑的夜晚，屋内亮着一盏暗淡的灯火，在我岳父家。半夜，六岁的女儿猛然从床上爬坐起来，显得非常惊恐，她要回家，回到她出生和生活了六年的那套房子里去。我和妻子立刻被她惊醒了，妻子安慰着女儿，我却陷入沉默。

早在数个月前，我和妻子决定把我们唯一的一套住房卖掉，随着女儿就学，准备在她校园边租房住，把卖房的钱作市场投资。我们的消息说出口之后，就遭到了女儿的反对，她哭着不同意，她不愿离开她生活过的房子。无论我们在她面前罗列房子许多的缺点，女儿都不以为然。尽管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讨论，最终，在三个月后的一天，我们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家，当着女儿的面把钥匙交给了别人。没想到在那天夜里——尽管是住在她外婆家，女儿在睡梦中害怕了，她惊恐的战栗让我有些不安。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妻子自以为的是选择却没有顾及到一个孩子的感受，忽略了她幼小的心灵对老屋的感情。在我们自认为以自己的青年之肩暂时能扛得起漂泊风雨的今天，我们忽视了“家”对我们的安慰，无视了它曾经为我们遮挡过无数次风风雨雨。

记得当初我离开校门之后的那段日子，如一根水面上漂浮不定的稻草，在打工的洪流中四处漂泊，累了，困了，就想回家，回到生我养我近二十年的故乡。而现实中，好不容易在冶炼厂的车间里找到一份活，在长江边的码头边找到一份装卸石头的差事，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地上找到一年半载的苦力活，在陵园里找到一份守墓的工作……我常常以没有时间为借口，很少回到故乡的老屋去歇息，而每个在异乡漂泊的夜晚，我是多么地想念我的老屋。有时，想着自己儿时是如何在那里点灯夜读，想着盛夏沐浴着穿堂风的惬意，情深之处，常常落下泪来。

2003年，我和妻子拿出全部的积蓄，决定在我们生活的小城里买一套相对便宜的房子，我们左挑右选，权衡着自己的能力，最终在西边的西边选了一套。即使是顶层，即使有东西，我们依然很高兴，觉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记得我第一次到岳父家，就是去借钱买房，因为我们首付款还不够，无奈之下，妻子对我说：“找我父亲借吧。”

在那套房子里，我们足足生活了十年。十年间，我的工作依旧不稳定，十年中，一批批大学生涌入职场，作为一名中专生，我在辗转之中从没有放弃学习，也就是在那套房子里，我常常挑灯夜战，回报而来的是一本本专业证书和陆续发表的文章。基于这一点，我应该感恩那套住房，感恩它给了我洗涤灵魂的空间。在不停跳槽的日子里，我也没有迷失自学的方向——只因在它的屋檐下。这样一想，我似乎与女儿对房子的情感有某种重合之处。

现在，房子卖掉了，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只得再向亲朋好友借上一点钱，重新买一个属于我们的家，迁居过去——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女儿一颗幼小的心灵。

得闲，立于窗前。

“鸟吟檐间树，花落窗下书”。檐下一棵树，鸟鸣三两声，窗前一个人，手执一书卷，落花四五片，飞入纸页间。诗中描绘的，是千年以前，李白向往的隐居生活。而眼前，我正悄然抵达。宁静的午后，明净的窗户，一个人，一本书，一杯茶，虚室生白，暗香浮动。

香是书卷墨香，茉莉清香，还是红茶醇香？兼而有之。茶本两盒，久未开封。发小自初中一别，杳无音信。辗转寻觅，漂洋过海，终得见面，在三十余年后，春风沉醉的晚上。曾经的小小少年，立鸿鹄之志，逐梦想而飞，成为某海外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久别重逢，恍然如梦，亲切、欢喜、激动，潮水般涌上心头。回故乡，返校园，见故人，他俨然回到从前，回到学生时代，不变的乡音，不变的味蕾，不变的笑容。近一个月时间里，他应邀前往几所大学做报告，进行学术交流。在路上，赏窗外风景，随时冲泡的，是我赠与的红茶。红茶一杯暖，暖的是身心，是岁月，是连绵不绝的同学情深。

◆ 吕国英

## “气墨灵象”邀约艺术未来

气墨灵象，简单说，是几个字、一个词语、一句短语；一般说，是几个观点、一个命题、一种理念；复杂论，是几大范畴、一大体系、一种思想。气墨灵象是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特殊形态、特别存在，是哲学、美学的，也是文化、艺术的，是宇宙万物的精神状态，也是生命理想的艺术存在；是美的最高境界，也是美的极致远方。

溯文化艺术滥觞，“轴心时代”的东西方先贤大哲，面对“我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时代“拷问”，分别以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物的苦思冥想与殚精竭虑，给出了儒学、道学、释学、美学的觉悟与智慧。如今，人类面临着同“轴心时代”相类似，且更广泛、更深远、更激荡的挑战，哲学、美学、宗教以及文化、艺术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纷乱之态、异变之象。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哲学、美学怎么了，文化、艺术怎么办？西方学界送出“转向学”应对，而东方智慧以“融学”解惑。所谓“融学”，就是融合之学；所谓“转向学”，就是21世纪美学，就是传统美学由“本体论”向语言、文化学转向的超文化美学。显然，两者均追求共同价值、普遍意义。气墨灵象所观照的理想性精神状貌、终极性审美境界，正是这种共同价值、普遍意义的文化承载、艺术表达。

气墨灵象，由“气”聚合（融通），以“墨”呈现，与“灵”纠缠，立“象”为美，是“融”的建构、“融”的统一，也是“融”的极致。而作为一种艺术新理论，不仅致力于其继承性、融合性、原创性，尤其敬畏于其完整性、体系性、闭合性。

“气墨灵象”艺术论，由眺瞻、纵横、察变、观象四部分构成。“气墨”是笔墨（语言）的未来，“气墨”“灵象”互为形式内容，“艺法灵象”揭示艺术本质规律，“高学大德”者方入气墨灵象之境，作者与受众互相推挽方可“筑峰”，“气墨灵象”统摄艺术创新，极致之美是气墨灵象，形成提出问题、关注现象、分析因果、解读趋势、预知未来的闭合性理论体系。“纵横”

留有一盒，似无心，实有意。譬如此时，他在大洋彼岸，我在巢湖岸边，窗前伫立，捧杯在手，鸟声两三响落入杯中，欣然端起，一饮而尽。我们的青春小山，越过山丘，掠过河流，各自散去，而今千山飞过，又重归枝头，用温暖的喙，将记忆的羽毛慢慢梳理。相识青葱少年时，重逢青丝染白霜。在袅袅的热茶里，往事被一——打捞上岸。

工作需要，办公室时有搬迁，选择临窗而坐，无一例外。能看窗外，能发呆，是唯一的理由。也因此，邂逅那只小鸟。细雨霏霏，空旷的操场上，它悠然踱着步。风来了，它不跑，雨来了，它不逃，恬淡而从容。一场雪悄无声息降临，待下课，操场上已白茫茫一片。孩子们撒了欢，打雪仗，掷雪球，雪地里打滚，扔在一边的小花伞，花花绿绿的小棉服，一幅线条简洁明快的水彩画跃然眼前。透过三楼玻璃窗，我欣喜不已，定格下这有趣的画面。搬到四楼后，风景又不同。置凌乱书籍于不顾，推开窗户，和一株高大挺拔的广玉兰不期而遇。枝繁叶茂，浓密的枝桠伸到窗边，叶片宽厚肥大，颜色

深浅不一，墨绿、深绿、浅绿、翠绿、嫩绿。一伸手，可以摸到叶片的脉搏。不触摸，只静看。批改作业疲惫之后，心情起伏之时，来到窗前，白色玉兰花浓郁的香气破窗而入，将我包围。无言独上西楼，是李煜的孤独，日日独上四楼，窗前小憩，是我无尽的欢喜。

窗前闲读也欢喜。弄笔，还须窗前……只此一句，便爱不释手。开篇寥寥数字，一副黑白水墨画缓缓铺开。一个人，一管笔，一张纸，一扇窗，一缕光，一盏灯，婉约古典的美尽收眼底。最打动我的，是作者在文中写道：弄笔窗前，最容易收到来自荒野的消息。窗子，是距离野外最近的一条路，露的气息，雪的消息，风的踪迹，月的身影，都能通过窗子溜进来。读罢，我任由记忆的手牵着，回到儿时乡下的日子。

小小一扇窗，是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房屋的眼睛、心灵的港湾。窗前人，眼中景，隔而未隔，界而未界。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都是光阴的故事。窗户开在墙上，可临，可观，可依。不妨心上也开一扇窗，通向幽远的心灵深处，可明，可清，可静。

为寻踪，是本论的基础与根本，也是延伸性重要内容。通过纵横寻踪，将文论的历史渊源、经纬演进、时代脉动、因果关联等，梳理清晰、精细呈现，建构本论的“大数据”与“云计算”。“察变”是本论的远观、检视与佐证，察视艺术史之重要艺术现象与演变，揭示艺术未来与发展。以本论的艺术哲学与审美眺瞻，于“察变”之中，释艺术之经典，予创作之灵感。“观象”是以本论的思想与体系，检视既往艺术思维理念，审察艺术创作万象；此“超越”是以“气墨灵象”为坐标，以艺术创作历史高点为基点，在不断超越与自我超越中，始终向着至美的远方前行。

“立论”寻踪为艺术哲学观、方法论，“慧灵”“超越”为审美创造观、实践论，亦为艺术创作进入艺术哲学与高维审美境界的具体路径论。通过察视艺术之演变与当下创作现象，建构通达至美审美之境，也使本论在历史与当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呈现广阔空间。

孟子言：“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兹论之中善、信、美、大、圣、神，是为孟子心目中完美人格的六重境界。就是说，向善的欲望，不可动摇的道德认知与内化信念，将善良的本性充满周身，充盈自我且照亮他人，普度众生以化育万物，教化万众而润物无声，是为六重境界。冯友兰说：人的精神境界有四个层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张世英认为，按照人的自我意识发展历程，即人的精神自由的高低程度，可将人生精神境界分为：欲求境界、求知境界（求真境界）、道德境界（求善境界）、审美境界（求美境界）。

其实，人的精神境界与审美境界，往往具有相合性、一致性，也与（艺术创作）作品的艺术境界相统一。换言之，有什么层次的精神境界，往往就有怎样层次的审美境界。不同精神境界的作家、艺术家，其作品的艺术境界也不同。

气墨灵象，在多层次天人合一的层面上，

所观照的是超越天地境界的精神状貌，所探究的是极致意义上的至美审美，而这种至美审美层级与境界的作品，唯由远离自然境界，拒绝功利境界，脱离道德境界，跨越天地境界，进入超验境界的作家、艺术家，并具备相关学养、创作元素、文化使命与艺术担当精神，方可创作完成、审美呈现。

检视文化艺术史，仅以艺术形态观，艺术语言呈现了具象、意象、抽象等形式，也在探索真象之形态、而意象之象则在象的远方。从形式语言论，具象与线墨相应，意象与意墨相携，抽象与泼墨相行，真象与朴墨相合，而灵象则与气墨相融，且“气墨”“灵象”不仅完美契合，又互为形式内容。如此，气墨灵象，在线墨具象、意墨意象、泼墨抽象的现实语境中走来，于朴墨真象的探索语境中超越，在眺瞻美的极致之远方语境中，既恍兮、惚兮，又惚兮、恍兮，是美的至美形态，也是美的无限遐想，又是美的不断超越。

西方艺术之完美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尽管有其科学文化的认识论基础与理性、自由之哲学思想的助推与引领，极致呈现理想美，现实美、表现美、自由美之艺术形态，但终究在具象、抽象、具象与抽象之中“穿插”“徘徊”与苦苦探索，也始终期待新的审美理念的建构与新的艺术形态的超越。

不言而喻，就其严格意义上，气墨灵象艺术，是至美审美境界中美的形态的立象表达，是生命理想之精神实现的艺术形态，是超越美学、超越审美、超越艺术且不断自我超越的远方呈现。而这种“存在”“表达”“呈现”，尚属非物质存在、非显现之美，尚需高学大德之文学、艺术诸大家，悉心探悟、戮力攀缘，如同探究“美本身”一样，不断追问思考、探寻完美答案。爱因斯坦曾言：“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显然，气墨灵象，从思想理念到现实存在，由审美境界到文艺（作品）呈现，需经漫长而艰难的探索、追求与观照，不仅充满挑战，更加值得期待。问题有了，答案还远吗？